

# 东亚合作的新态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宋均营<sup>1</sup>

(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当前东亚合作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态势: 中国的兴起使“机遇论”和“威胁论”同时上升, 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美国重返东南亚, 试图主导东亚及亚太合作进程; 日澳等国提出区域合作新构想; 东盟“大国平衡”战略更为明显, 东亚合作政策将趋于内向保守。鉴于此, 笔者提出了“一个重点(中美协调)”、“两个轴心(中日韩与东盟)”、“三个内环(10+ 1、10+ 3、10+ 6)”、“四个外围(APEC、ARF、SCO、ASEM)”的东亚合作战略构想。

**关键词:** 东亚合作; 中美协调; 东亚共同体; 战略空间

**中图分类号:** D814.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8049(2010) 05- 0041- 08

亚太合作二十年、东亚合作十多年来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第一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域内合作的重要性, 以“10+ 3”机制为主的东亚合作制度化, 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二次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 机遇论和威胁论也同时针锋相对; 区域内各国纷纷积极应对, 或调整政策或提出新构想, 东亚合作呈现了一些新态势, 这使中国开展区域合作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给中国的政策选择带来很多挑战。目前, 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当中, 因此, 中国应该与时俱进、通盘考虑, 制定立足长远、放眼世界的区域合作战略。在继续坚持“多层架构、功能性合作为主、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前提下, 确立“一个重点、两个轴心、三个内环、四个外围”的战略规划。

“一个重点”是指加强“中美协调”, 处理好中美关系这个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增进共同战略利益; “两个轴心”是指“中日韩”和“东盟”作为两个轴心共同驱动东亚合作进程; “三个内

环”是指“10+ 1”、“10+ 3”、“10+ 6”三个机制层层相叠、环环相扣, 衔接好双边与多边、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 “四个外围”是指将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亚欧会议(ASEM)四个外围机制作为开展东亚合作的重要依托。

这就要求中国在做好“中美协调”的基础上, 巩固和落实已经取得的东亚合作成果并继续推进; 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亚太合作、以中亚为战略腹地、欧洲为回旋空间, 发展有利于我的合作战略。

## 一、当前东亚合作的新态势

### 1.1 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格局的演化, 机遇论和威胁论同时存在, 参与区域合作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这场起源于美国, 后扩散到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使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 至今

收稿日期: 2010-04-21; 修订日期: 2010-05-10

作者简介: 宋均营(1976-), 男, 山东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 主要研究方向: 中日关系、亚太合作。

未能恢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受到影响,但经济仍保持了较高增长。根据各国公布的统计数字,2009年全年,美国 GDP 下降 2.4%,欧盟下降 4.2%,日本下降 6%;相反,中国增长 8.7%,印度增长 6.1%。

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二战”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遭到质疑,其霸权形象和软实力也不同程度地受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危机中受的影响较小,复苏较快;再加上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受到国际高度关注的世博会,其地位和形象快速上升。

中国经济总量有望于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巨大的商机和发展前景,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机遇,并期望中国在引领世界走出危机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让很多国家感受到“威胁”。于是出现了机遇论和威胁论针锋相对的现象,尤其在邻国之间。这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和推动区域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

在可预见的将来,“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虽将持续,但多极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朗。以中印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迅速提升。

## 1.2 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通过利用和整合现有机制,试图主导区域合作进程

奥巴马上台以后,重新提升了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参与亚太事务。2009 年 7 月,美国务卿希拉里在曼谷宣布“美国回来了”,标志着美国重返东南亚;7 月,美国同东盟签订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11 月 14 日,奥巴马在东京宣布他是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并于 15 日召开了首届美国—东盟峰会;2010 年 1 月,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亚太政策演说,强调美国在亚洲不是一个“过客”,而是“常住国家”。<sup>1</sup>

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首先要防止在该区域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区域集团,损害美国利益。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于 2009 年 10 月访问北京时表示,“目前亚洲地区的主

导机制并不明确,但任何涉及到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将美国抛置在外,美国是一个活跃分子,我们会参与其中”。<sup>2</sup>如果说这反映的是一种防御性姿态的话,那么通过利用和整合现有机制,主导区域合作进程,就表现出了美国的“积极作为”。

面对日益深化的东亚合作,美国并不直接表示反对,而是采取了一个“后路包抄”的迂回战略。开展亚太合作,以 APEC 为平台构建“亚太共同体”是美国自 1993 年西雅图会议以来的一贯目标,但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才没有成功。2006 年 APEC 河内会议上,布什提出了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的设想,但未引起较大反响。目前,美国则期望在 APEC 范围内,以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sup>3</sup>为手段,建立 FTAAP 的“缩小版”(APEC21-X)。在 2010 年 3 月的墨尔本会议上,美国、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加入 TPP, P4 变为 P8。美国目前有争取加拿大、日本、韩国加入该组织的考虑,如果日韩都加入,将会对今后东亚合作拟推动的中韩、中日双边 FTA<sup>4</sup>和中日韩三边 FTA 以及“10+3”的东亚自贸区 (EAFTA) 形成“后路包抄”之势。当然目前日韩也都在观望之中,各国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TPP 只是在 APEC 范围经济领域的合作,那么在亚太层次上更大的架构则是整合 APEC、ARF(东盟地区论坛)和 EAS(东亚峰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sup>5</sup>曾建议,将 APEC 峰会

<sup>1</sup> Hillary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Jan 12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m/2010/01/135090.htm>.

<sup>2</sup>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0/4/5/101104580.htm?colid=7&kindid=0&docid=101104580>.

<sup>3</sup>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简称 TPP,也有人称为 TPPA,原被称为 PA,是 APEC 内 4 个小国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于 2005 年签定的自由贸易协定。

<sup>4</sup> FTA 是自由贸易协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的简称。它是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相关问题达成的协议。

<sup>5</sup> Evan A. Feig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in New Asia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0446/united\\_states\\_in\\_the\\_new\\_asia.htm?breadcumb=%2Fpublication%2Fby\\_type%2Fspecial\\_report](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0446/united_states_in_the_new_asia.htm?breadcumb=%2Fpublication%2Fby_type%2Fspecial_report)

和东亚峰会合并, APEC降格为亚太经济部长会议, ARF变成亚太安全部长会议, 形成“一个峰会、两个论坛”的架构。若真能走到这一步, 西雅图会议以来的“亚太共同体”目标或将成为现实。

### 1.3 日、澳等国为谋求自身国家利益和扩大地区影响力, 提出区域合作新构想

#### (1) 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构想

2008年6月,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发表演说, 呼吁亚太各国在2020年前建成“亚太共同体”。为了弄清楚亚太地区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 陆克文派出资深外交官巡访各国征求意见。2009年, 在10月的亚洲峰会和11月的APEC会议上又不断推销其主张, 随后于12月在悉尼召开了“亚太共同体”会议, 邀请各国政要、学者和媒体人士参加。

澳大利亚虽然在文化和制度上更认同西方, 但近年来和亚洲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对亚太的依赖超过欧美, 中日两国已分别成为其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亚洲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又同时存在着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巨大威胁时, 作为曾经倡导建立APEC的国家, 澳大利亚积极提出地区合作新构想, 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的地区——亚太地区, 仍然缺少一个地区机构, 具有广泛的成员和授权, 处理21世纪——亚太世纪我们所面临的广泛的深层次的政治、安全、经济与环境挑战。”<sup>1</sup> 这也反映了亚太地区的实际情况。

那么“亚太共同体”到底应该具有什么结构特征呢? 陆克文的定义是: 一、必须涵盖本地区的所有国家; 二、必须涵盖本地区所有的政治、经济、战略问题; 三、必须塑造透明和信任的习惯, 培养合作精神; 四、必须举行领导人级别的会议; 五、不需要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决策机构; 六、不需要“另起炉灶”, 利用现有机制就可以, 如APEC、ARF和EAS。有三种可以利用现有机制的方法, 一是以APEC为平台, 增加其安全功能并让印度加入; 二是以东亚峰会为平台, 需要扩大成员国; 三是将APEC和东亚峰会整合起来。由此可见, 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构

想和美国期望的亚太架构是很相似的。

#### (2) 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日本民主党为实现“政权更替”, 凸显和自民党政策的不同, 在其竞选纲领中写入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政策目标。<sup>2</sup> 2009年8月, 鸠山发表了《我的政治哲学》一文, 倡导“友爱政治”, 并将“友爱”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鸠山上台之后, 更是在不同场合力推其说。

东亚共同体构想本是一盘“冷饭”, 现在被鸠山“炒”成热门话题, 引人注目。鸠山同时提出了建立“紧密而对等的美日同盟”的主张, 又是在国际格局出现重大转变的背景下, 所以被赋予了更多含义, 也引起了人们超于小泉构想的赞同和反对。

鸠山构想基本上继承了历届自民党政府对“东亚共同体”的政策见解, 如: (1) 在范围上, 仍坚持以“10+6”国家为基础; (2) 以功能性合作为主, 不急于制度化建设; (3) 坚持开放的地域主义原则; (4) 以EPA/FTA为手段, 促进经济领域的整合。但也有相区别之处: (1) 暗示以中日韩为核心; (2) 将友爱思想作为基本理念; (3) 对美国有所排斥。虽然鸠山表示不排斥美国, 但绝不是全盘欢迎, 至少是部分排斥; 而自民党时期虽然没有提及美国 and “东亚共同体”的关系, 但一直奉行“美日同盟”优先, 东亚共同体是从属的, 鸠山构想的意图是至少将二者并列, 至于将来能否做到“美亚并重”, 现在还难以预测。

鸠山构想是日本为了在“霸权国家”美国 and “准霸权国家”中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一个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主党对日本所面临的内外危机的深刻认识, 也表明了新生代政治家的民族主义倾向。从要日本发挥“桥梁”作

<sup>1</sup>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http://www.pm.gov.au/node/6368>.

<sup>2</sup> 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中关于东亚共同体是这样表述的: 以构筑东亚共同体为目标, 强化亚洲外交: 1. 全力构筑与中、韩和亚洲各国的信赖关系; 2. 在通商、金融、能源、环境、救灾、传染病对策等领域, 确立亚太地区的区内合作机制; 3. 积极推进与包括亚太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投资、劳工和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的EPA和FTA谈判。 <http://www.dpj.or.jp/special/m-anifesto2009/txt/m-anifesto2009.txt>

用以及“中美日关系为正三角形”关系的说法可以看出,民主党似乎在践行着小泽一郎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普通国家论”。

鸠山构想能否为其他国家所响应,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目前鸠山已经表示,要在 2010 年 5 月份就东亚共同体的具体内容拿出一个研究报告,估计到那时才能看清其构想的全貌。

### 1.4 东盟“大国平衡”战略更趋明显,区域合作政策将更加内向和保守

东盟 10 国相对而言国力弱小,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只能实行“大国平衡”的战略。长期以来,由于中日韩三国相互缺乏信任,东盟稳坐在“驾驶员”席位上发挥主导作用。2008 年 12 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以独立于东盟的形式召开,引发了东盟被边缘化的担心。东盟一直担心中日关系恶化,但也不希望中日关系变得密切。目前中日韩三国合作顺利开展,中国实力增长迅速,东盟感受到了威胁,于是有了李光耀邀请美国留在亚洲平衡中国的言论。

因此,虽然东盟决定要在 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但进一步推动东亚合作深入发展的动机不足。比如东盟已经和“10+6”的其他国家都签订了“10+1”的 FTA,但是对于将其统一成“10+3”或者“10+6”的 FTA,态度消极。

## 二、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东亚合作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这既有利于我国将东亚合作引向深入、更好促进国家利益的积极方面,也有中国威胁论上升不利于我国开展合作的消极方面;这其中,既有源于内部的压力也有来自外部的挑战。

有人说目前的东亚合作进入了深水区,有人说是到了转折点,还有人说走到了头。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在审视以往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能将我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相平衡的区域合作战略。

笔者试图提出“一个重点”、“两个轴心”、“三个内环”、“四个外围”的政策建议,作为中国开展东亚合作的战略规划(见图 1,图 2)。

图 1 是一组以东盟为圆心的同心圆结构图,说明目前的东亚合作是以东盟为主导,依“10+1”、“10+3”、“10+6”向外扩展。

再向外的一圈是以 APEC、ARF 为主要平台的亚太合作圈,作为影响东亚合作最重要外部因素的美国,位于这个圈内;最外的一圈则是和东亚合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上合组织和欧亚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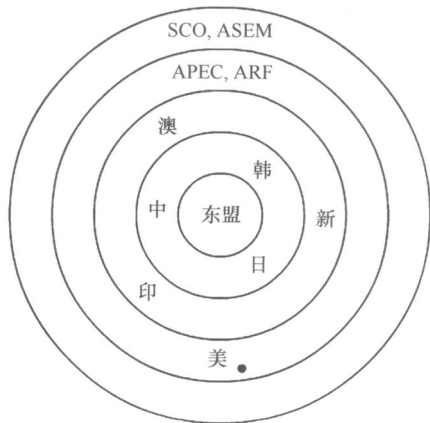


图 1 目前东亚合作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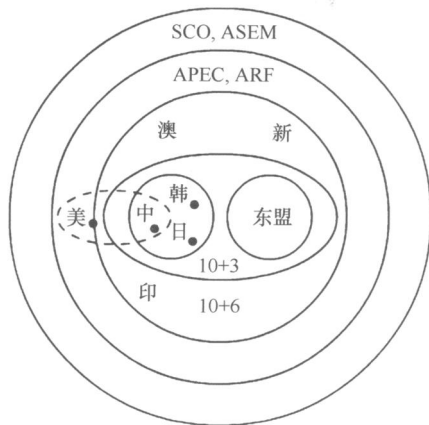


图 2 笔者构建的东亚合作结构模式

图 2 的最中心是一个以中日韩和东盟分别为两个焦点的椭圆,意即东亚合作不再围绕东盟一个“圆心”来转,而是以中日韩和东盟两个“轴心”来转。最外面的两个圈表示的仍是以 APEC、ARF 为主要平台的亚太合作圈及上合组

织和欧亚会议圈。不同的是美国的位置发生了改变,放到了“10+6”圈的圆周上,意指美国或许会加入东亚峰会从而进入“10+6”圈(当然那时应该称“10+7”或者更多)。而不管美国在哪个点上,都会和中国所在的点构成另外一个椭圆,意指中美协调的战略重要性。虚线,是说中美协调不一定非得形成一个有形的机制,更应作为一种战略思维,统领东亚合作的方方面面。

## 2.1 一个重点——中美协调

美国是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外部因素,处理好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美外交所应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中美协调”。谈到协调,最著名的例子是“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大国协调维持了欧洲百年的和平。虽然现在中美之间实力差距很大,我们还不具备跟美国开展“均势”外交的条件,但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变化越来越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中美协调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1) “协调”vs“对冲”

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敌人”、“竞争对手”、“非敌非友”、“合作伙伴”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变化,每个时期的具体政策表述也不相同,但基本思路仍然是“接触加遏制”。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hedging”,可以译为“对冲”也可以译为“两边下注”,基本还是“接触和遏制”的两手政策,不过在中美关系深度互动高度依赖的今天,称之为“融合和牵制(integration and containment)”<sup>1</sup>更为合适。

那么中国的对策“协调”(concert),也包含两手政策,即“合作与竞争(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一方面,我们不会主动选择和美国对抗,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绝不会对美屈从,会在各个领域跟美国展开和平竞争,因而“协调”一词兼有“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含义。

这样,就可以把中美之间的关系模式总结为:以“协调战略”应对“对冲战略”,以“合作与

竞争”来应对“融合与遏制”。

### (2) 强化“中美协调”,反对 G2 论<sup>2</sup>

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具有全球性。“G2”论也部分反映了这一事实。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森(Bergsten)于 2008 年在《外交》杂志上首次提出 G2 构想,并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召开媒体电话会议,认为“美国要想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就得和中国分享领导地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应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强调了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基辛格也主张,中美两国应该提升双边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G2 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地位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危机时期借重中国、要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挑拨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策略,“捧杀”中国的意图很强。这些论调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反对,温家宝总理在 2009 年 5 月出席中欧会议时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虽然反对 G2 的提法,但中美关系的很多方面确实出现了类似于 G2 的模式,2009 年 4 月的 G20 伦敦峰会及 12 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被舆论解读为中美两国唱戏的舞台。但我们不能因为担心被理解为 G2 而弱化中美协调的力度,缩小中美协调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在制定东亚合作区域战略时必须将中美协调作为一个重点的原因。

### (3) 东亚合作中的“中美协调”

开展“中美协调”有“双边”和“多边”两种途径。双边层面,中美之间已经将 2005 年 8 月启动的“中美战略对话”和 2006 年 12 月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升级为“中美战略与经济

<sup>1</sup> 美国问题专家袁鹏将深化发展阶段的“接触与遏制”政策表达为“融合与牵制”。<http://www.hycfw.com/haiyang/2124.aspx>

<sup>2</sup> G2 即指中美两国集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部分西方国家炒作 G2 概念,甚至提出“中美共治论”。

对话”,这种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的“2+2”会议为双方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对话渠道,涉及的话题超越双边,涵盖全球。这是“中美协调”的重要平台。多边层面开展“中美协调”的场合更是数不胜数。双边协调做得好,可以促进多边协调;多边协调做得好,也会缓解双边协调的压力。在东亚合作中,中国要做到:<sup>1</sup> 尊重美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不主动挑战其既得利益。<sup>2</sup> 不排除美国加入东亚合作进程,欢迎其发挥积极作用,抵制其消极影响。美国是否加入东亚峰会要由东盟来决定,但要整合东亚峰会和 APEC、ARF 而构建以其为主的亚太共同体,要予以抵制。在 APEC 内推进 TPP,要冷静观望,一方面推动东亚自贸区的建设,一方面做好必要时加入的准备。» 区域合作的理想目标是将整体的东亚与美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太平洋关系”,把东亚合作的成果作为开展“中美协调”的重要抓手。

## 2.2 两个轴心——“中日韩”和“东盟”

到目前为止,东亚合作采用的是东盟主导的方式,作为地区大国的中日韩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为区域合作的轴心。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战略应该是在尊重东盟核心的前提下,加强中日韩合作,以中日韩和东盟两个“引擎”发动东亚合作的“大车”。

加强中日韩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削弱东盟。可以采用增量原则,即目前东盟主导的一切机制照常运转,而独立于东盟之外的中日韩三国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逐渐做大做实,和东盟这个轴心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在东盟动能不足(能力不足和意愿不足)时,东亚合作的“大车”仍然能够跑起来。

中日韩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在第二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决定推动三国官产学联合的自贸区研究,达成了多项合作项目。

对于中国提议的中日、中韩及中日韩 FTA,

日韩两国一直都比较消极,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即使不和中国订立自贸区协定,日韩企业在中国仍能享受很多优惠条件,而中国企业在进入日韩市场方面则面临着诸多限制。因此,中国方面的急迫感更为强烈。

鸠山政府成立后,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并主张以中日韩为核心来推动,这反映了日本政府在东亚合作政策上的一个转变。鸠山明确提出,东亚共同体将会以欧盟为榜样,暗示中日可以效仿法德实现和解,共同主导区域合作进程。既然日本方面发出了这样积极的信号,中国应抓住机遇,推动中日韩合作快速发展。

## 2.3 三个内环——“10+1”、“10+3”、“10+6”三个机制

“10+1”、“10+3”、“10+6”三个机制层层相叠、环环相扣,形成了东亚合作的三个主要架构。这三个机制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基于目前域内各国的情况,整合为一个机制的可能性很小。

“10+3”的产生,和“10+1”的关系密不可分。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新加坡发表演说,建议东盟和日本定期举行首脑会议。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担心这样会引起中国的猜疑,建议召开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议,于是才有了1997年12月的第一届东盟和中日韩首脑会议(当时是“9+3”)。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提交了研究报告,建议将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提出为了早日实现该目标,应该尽早召开各国独自参加的东亚峰会。为和中国争夺主导权,日本力主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三个所谓的民主国家拉进东亚峰会,于是第一届东亚峰会以“10+6”的方式召开。本来按照东亚展望小组的预想,东亚峰会召开后,“10+3”将被取代,但结果是“10+3”和“10+6”同时保留下来,并在《科伦坡宣言》中将“10+3”定位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主渠道,“10+6”作为一个首脑论坛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机制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目前来看,整合为一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仍将保持现状。中国应该在这三个层次

上积极开展合作, 巩固和落实好目前所取得的成果。

在“10+1”层次上, 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为契机, 落实领导人会议所达成的合作项目, 早日实现中国—东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大湄公河、环北部湾、东盟东部经济增长中心等次区域合作项目。在“10+3”层次上, 目前已经成立了 50 多个对话机制, 在 20 个领域开展了上百个合作项目。今后“10+3”的目标是建立东亚自贸区 (EAFTA)。在“10+6”的层次上, 目前仍是首脑论坛的性质, 将来是否提升为更有约束力的机制, 要视情况而定。针对中国提议的东亚自贸区 (EAFTA) 主张, 日本提议以“10+6”为基础建立“紧密经济伙伴关系 (CEPEA)”。目前, 针对这两个提议的研究双轨运行, 哪个走到前边就实行哪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将来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将它们纳入到东亚合作的框架, 长远来看, 符合中国的利益。

#### 2.4 四个外围——亚太经合组织 (APEC)、东盟地区论坛 (ARF)、上海合作组织 (SCO)、亚欧会议 (ASEM)

虽然我们将 APEC、ARF 和上合组织、亚欧会议都看作东亚合作的四个外围, 其实它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APEC、ARF 与东亚合作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范围上包含了东亚地区, 可以看作是东亚合作的自然延伸。上合组织、亚欧会议虽与东亚合作没有直接关联, 但是能为中国开展东亚合作提供更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 增加对美协调的能力。

APEC 已经走过二十年的历程, 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 也面临着很多挑战。1994 年, APEC 制定了发达国家于 2010 年、发展中国家于 2020 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 目前来看实现的可能性较小。APEC 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 RTA/FTA 的大量涌现, 对作为非约束性论坛的 APEC 造成了冲击; APEC 冗长缺乏效率的决策方式也让很多人对其感到失望。对于将来 APEC 是否要改变其论坛性质变得更有约束力, 各国看法迥异。在中国, 也出现了两种声音: 有

人主张将其约束力提高, 因为中国的企业也要走出去, 也要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某种意义上, 中国的国家利益取向正向发达国家“趋同”。但更多的人主张维持 APEC 的论坛性质, 认为中国的实力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说跟发达国家“趋同”还为时尚早。发达国家在 APEC 内推动的“边界内”议题, 涉及到国内的投资环境、劳工和环境标准等, 如果一旦成为有约束力的决议, 对中国的冲击很大, 所以中国不应跟着起哄去改变现状。笔者认为: 前一种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 但是综合来看, 继续维持 APEC 的论坛性质对中国更为有利。

ARF 成立于 1994 年, 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1995 年, 在文莱召开的第二届会议, 为 ARF 的将来发展制定了“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创建解决冲突机制”的三阶段目标。通过多年来的对话, 第一阶段的目标已经实现, 目前处于开展预防性外交的第二阶段, 离第三阶段目标还很遥远。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特别复杂, 既有冷战遗留的传统安全风险, 又有不断涌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涵盖全区域的集体安全机制, 更有学者倡议在 ARF 的基础上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sup>1</sup>。为了维护周边的安全环境, 延长战略机遇期,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 ARF, 尤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推动六方会谈制度化, 将东北亚安全磋商机制和 ARF 衔接起来。这样既可以减轻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轴辐”体系对中国的压力, 也可以有效化解“中国威胁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前欧亚大陆最大的地区性合作组织, 从 1996 年的“上海五国”发展到目前的“上合组织 (‘6+4’)”, 已经在安全合作和经贸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影响力日益增大。虽然上合组织与东亚合作没有直接关联, 但是作为中国主动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一个机

<sup>1</sup> 刘江永、阎学通: “关于加强东亚安全合作的建议”, <http://www.tsinghua.edu.cn/xi-suo/gj/ky/yxt/wz/21.htm>.

制,对于缓解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起到了很大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在欧洲实行“北约东扩”,一方面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存在,从东西两个方向挤压中俄的战略空间。“9·11”之后,以反恐为名将其势力扩展到中亚地区。上合组织对于中国开展东亚合作,缓解东部战略压力起到了侧面支援的作用。

亚欧会议成员的人口占世界的 57%,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作为亚欧两洲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平台,重要性不言而喻。“亚欧之间经济上互有需求,战略上彼此借重,文化上相互借鉴,这是亚欧会议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sup>1</sup>亚欧会议曾间接促生了“10+3”的东亚合作机制。以欧洲和亚洲为单位参与会议,对于亚洲国家塑造共同的亚洲归属感也有帮助,

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也可为东亚合作提供借鉴。在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的今天,与作为重要一极的欧洲开展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由此看来,温家宝总理选择在“中欧峰会”上反对“中美 G2”论不是偶然的。

上述“一二三四”的数字顺序并不意味着战略选择的优先次序,除了“中美协调”应该统领全局外,“二轴”、“三环”和“四围”是对东亚合作战略构想的简要概括,并不是说哪个一定要先做,哪个一定要后做。应该坚持开放灵活的原则,维持多层架构,根据各国博弈的结果随时调整优先次序,“在可预见的将来,亚太区域合作仍将是多机制、多层次、多速度,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这样才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责任编辑 薛迎春

## New Situation of East Asian Cooperation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SONG Junying<sup>1</sup>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East Asia has witnessed some new situations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rising of China has made talks about both “China Opportunity” and “China Threat” more prevalen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been made more complicated for China to a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ttempted to come back to Southeast Asia; Japan and Australia presented respectively new concepts of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Asian Pacific Community; ASEAN became more “balance-of-power” strategy minded and East Asia will tend to be more passive and conservative in their cooperation policy. Thus the author suggested a new regional strategy for China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one vital point (Sino-American coordination)”; “two axis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paralleled with ASEAN)”; “three inner circles (10+1, 10+3, 10+6)” and “four outer layers (APEC, ARF, SCO, ASEM)”.

**Key words** East Asian cooperation; Sino-American coordination; East Asian community; strategic space

<sup>1</sup> 潘光:“亚欧会议进程与中国”,《求是》2008年第28期。

<sup>2</sup>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2009年10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http://www.chineseembassy.org/chn/gxh/tyb/fyhb/t/jzhs/620587.htm.